

## ● 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

## 差票与签、存查的对比分析

——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例

金生杨 袁 慧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 差票和签是清代地方官府处理政务时常用的下行文书,在文书形式和功能等方面颇为相似。但二者又存在明显差异,最直观的表现是被唤人员名单,前者多单独开列于正文之后,数量较多,而后者多夹叙于正文之中,数量较少;在署衔、事由以及书役办差地址信息和期限等方面,签较差票简略、方便。存查作为一种文书种类,出现时间较晚,作为差票的副本附卷留存备查,与差票的规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差票; 签; 存查

**中图分类号:** K20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7)05-0014-07

DOI:10.16246/j.cnki.51-1674/c.2017.05.003

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进入人们的视野,参与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也日渐增多。摆在学者面前的,首先就是档案文种及其内涵的问题。档案文种多而杂,很多文种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尽管随着档案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一些重要文种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但面对众多的文种,仍有语焉不详的情况。档案整理成果中,文种标注错乱或混用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因此,准确判断文种、明确辨析其内涵及相互间的差异,在档案整理与研究上仍十分必要。差票、签、存查作为州县衙门档案中最基本的文种类型,学界对此也有所研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相当深入<sup>①</sup>,但差票与签、存查的对比分析,则未见其文,有待发覆。今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为例,对此略加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 一、差票与签

作为清代地方官府众多下行文书中的差票和签<sup>②</sup>,在形式和功能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少差异。

首先,差票和签是地方官府常用的下行文书,都

可作为书役查勘案情、传唤人员、拘押人犯的凭证。就其历史而言,清袭明制,差票本身也有一定的因革变化<sup>[1]</sup>。也有学者认为,“差票”是一种特殊的“信牌”,由“信牌”发展、分化而来,是基层官府“差人”信牌的专门化<sup>[2]</sup>。此外,差票也可用于催缴、饬办、移解等事务。签本为一种尖细的小竹片,在上面书写符号或文字就可以作为标识,后来演变为官府交给书役拘捕、惩罚犯人的凭证<sup>[3]1617</sup>。现存档案中,签也会被用于查勘、传唤、拘押等事务。总之,差票和签都是地方官府常用的凭证性文书。

其次,差票和签在某些时候起着同等的作用,但二者的使用又不尽一致。滋贺秀三研究《淡新档案》,把差票分为调查票、取证票、督责票、调解票、遏暴票、查封票、传讯票、逮捕票等八种<sup>[4]</sup>。《南部档案》中的差票大致也不超出这八种类型。同样,签的功能也有不少,主要用于查勘、传唤、拘押、催解、饬令等事务。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差票与诉讼纠纷有关,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是用于传唤人员、拘押人犯、查勘案情等,而在银粮的催解和饬令的传达上,签的使用更为常见。

收稿日期: 2017-05-18

基金项目: 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 2013 年度重点项目(YWHZ13-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93);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 2017 年度一般项目(QYYJC17012); 西华师范大学 2016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CXCY2016071)

作者简介: 金生杨(1974-),男,重庆万州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巴蜀历史文化;袁 慧(1994-),女,四川眉山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最后,在文书格式上,差票和签大体相似,但又有详略的差别,签往往较差票更为简略,显得不

够正式和严谨(图1、图2)。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图1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南部县正堂袁为差唤灶民杨大银等具告梁廷福等藉卖盐索刁唆掠盐案内人证赴县候讯事票(《南部档案》Q1-13-488-4)



图2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署南部县事张为签唤盐役蒲顺具禀豪灶古明顺等一案人证以凭究追事签(《南部档案》Q1-15-345-2)

(一)在署衔方面,签较差票更为简略。差票和签是书吏以地方官员的名义发出的公文,一般以全衔表明发文官员的身份。“按规定,清代的公文均要署前衔,凡官方规定的正式文种在署前衔时,基本上是全衔,除标明官员的正职外,还附有兼职、加级、纪录、随带军功、所带处分等。”<sup>[5]</sup>差票的发文者基本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的,如“钦加同知衔直隶州用署理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许”即是全衔<sup>③</sup>。与差票不同,签在署衔时,大多只标明官员的正职、兼职,而很少标明官员的加级、纪录、随带军功、所带处分等,如“钦加同知衔直隶州用署理保宁府南部县正堂许”即如此<sup>④</sup>。在咸丰以前,签甚至只以“特授南部正堂李”或“正堂陈”等类似的署衔来表明发文者的身份,显得极为简略。所以,相较于差票,签在表明发文者身份时更为简洁明了。

(二)相较于差票而言,签更多地是在事由上表明文种,又时常在正文前省略事由。差票往往表述作“为差唤事”“为查勘事”“为缴委实覆事”等,并不都含有“差”字,而签则常表述作“为签唤事”“为签飭事”“为签催事”等,多用“签”字以明其文种。

不同于差票在格式上的严谨,签常常会省略正文开始前的事由,直接以“签仰”二字开始正文内容,在正文中详述具体事由及目的。

(三)差票和签在开列被唤人员姓名的方式和数量上并不相同。差票和签在正文末表明发文目的及需要办理的具体事务时,除了可以判断文种的“票”“签”外,最大的不同表现在被唤人员名单的开列方式上,前者多附于正文之后,数量较多,而后者

则多在正文内容中点明,数量较少。

在传唤、拘押等类差票中,最常见的书写模式是正文套路式叙述,然后在正文末尾单独开列一长串被唤人员姓名,包括原告、被告、原告、词照、干证、添唤等,而先以“计开”“计唤”等作标题式开头。如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初七日,南部县正堂王为差唤民人张仕禄具告汪自银查实霸配一案人证以凭究追事差票:

……为此票仰该役前去,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藉票需索,滋事迟延。如违,重究不贷。慎速,须票。

计唤 被告:汪自银、汪正福、汪本志、蔡童子、蔡福应

词照:蔡氏、汪洪、汪自益

干证:宋文友、向春琰

原告:张世禄

住崇教乡杜门坝,离城七十里。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七日 礼房呈。

稿 行<sup>⑤</sup>

但也有例外,用于查勘、勘验等的差票便不需要单独开列。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六日,署南部县事宝为查勘汪治一等具告胡居安等霸房抗搬案内情形事:

……为此票仰该书前往,协同约保查勘汪治一猪圈、楼板、田水、红苕、瓜苗、竹树有无被胡居安等拆毁估伐情事,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办。去书毋得藉票需索,滋延干咎,慎速,须票。



(四) 差票和签均以公式性的戒语作为正文结尾。由于书役等借公文以谋私利的情况常有发生,因此,在差票和签的结尾部分,往往有对书役的行为作公式性的规劝或者限制,以表明官府的态度,“去役毋得藉票/签需索,滋事迟延”,有时还声明违反的严重后果,“如违,重究不贷”。最后,以“慎速,须票/签”或“须票/签”等语作结,表明文种。如“去役毋得藉签需索,滋延干咎。慎速,须签”<sup>[10]</sup>,“去役毋得藉票需索,滋事迟延。如违,重究不贷。慎速,须票”<sup>[11]</sup>。

(五) 签在注明书役办差地址信息时更为随意。不管出具差票或签的目的为何,总会有一个具体的办差目的地,以便书役手持凭证后有明确的赶赴目标。因此,差票在票面上往往会注明“住××,离城××里”,且位置比较醒目,多在正文之后、日期之前另起一行书写,比较详尽严谨。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三日,南部县正堂袁为差唤陈致祥具告唐凤翥等伙套欺撇一案人证以凭讯追事差票:“住福德场,离城一百里。”<sup>[12]</sup>

相比于差票对此项的重视,签在对地址的处理上显得更为随意、灵活。大多数时候,在签同样的位置,看不到办差地址,而更多地是在签文内容中已经提到,只是没有差票的表述精确。如光绪九年(1883)六月二十七日,南部县正堂张为签拘灶户李德璠赴分县听候吩示事签称“签仰该役前去,速拘盘龙驿私煎盐井之灶户李德璠,刻即随签押送分县,听候吩示”<sup>[13]</sup>,只言明办差地点为“盘龙驿”,而没有表明具体“离城××里”。在个别时候,签从头到尾都未曾提及办差地址。例如光绪九年(1883)二月初七日,南部县正堂张为签唤曾德元具告宋德辅擅用缴项案内人证候讯事签<sup>[14]</sup>,全签均无办差地址的表述。这大概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签这种文书自身的灵活性,可以尽量简略;二是书役们已经知道该去哪里办差,因此没有必要在文书中言明。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签作为正式的文书,有失严谨、规范。

(六) 签在对办差期限的规定上不似差票明确。为了提高办事效率、防止胥吏借文书需索等弊,差票皆有办差期限。在差票中,目的地与衙门距离的远近关系到持票书役完成任务的期限,如“任何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被传之人带到衙门的衙役,将被查究并笞惩”<sup>[6]112</sup>。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对限期的一般衡量标准做了详细描述“上司公文牌票,非催攒

案件,即拘提人犯,各该经承须严立限期完结。如空文可覆者限三日。催起解钱粮、批审词状者,先具文申覆宽限,俟即解报,亦限三日。其皂快等承票下乡,量离城远近立限,大约三十里限次日,六十里限三日,九十里限四日或五日。遇有机密紧事,另差马快,星驰回缴,不在此限。其限期既立,必须照限查比。逾限不销,必须照逾限久近责惩,使彼有所儆惧而不敢怠玩。”<sup>[7]264</sup>严格的规定以及一定的惩处,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书役的渎职行为。但此项规定也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在特殊情况下,限期销号的规定具有通融性。“然又有地虽近而事难立销者,若逾限不责,是自爽其法。故于近地,又当酌事之难易以少宽之,未可过于拘泥也。”<sup>[7]264</sup>为了防止书役过限不报,官府也有专门的措施,即定期清号。“其清号日期,一月六次,择定空日查比。早堂事毕,责成该吏唤各房及差役听比。如比日,该吏不禀,即以延捱作弊重责。其销过废牌,即勾抹存署内,以备查考。”<sup>[7]264</sup>官府不仅在差票上对书役的办差时间作了明确限制,而且还要求书役等在办差完毕后将票上交衙门销号,“其销差之时,该差同原承行持号簿,当堂照号回销”<sup>[7]239</sup>。

相较于差票的严定期限而言,签就显得宽松得多,虽然也会要求书役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但并没有明确,更多地只是公式性的套语,如前文提到的“慎速/火速,须签”等。

综合而言,差票和签都是正式文书,是由官府发出、书役执行的下行文;其行文格式相似,从事由、目的到结语部分等都是公式性套语;在功能上,都可用于查勘、传唤、拘提等事务。但相比于差票,签的行文更为随意,内容更为简洁,使用也更具灵活性。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签同差票一道,同时作为地方官府常用的下行文书。

## 二、差票与存查的关系

在《南部档案》中,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文种,被称为“附卷存查”或“存查”<sup>[15]</sup>。一般所言的“存查”是一种档案管理制度,即存以备查,保留簿籍登记等以备查验<sup>[8]1162</sup>。《清会典事例·户部·积储·社仓积储》:“其簿籍之登记,每社设立用印官簿,一样二本,一本社长收执,一本缴州县存查,登记数日,毋得互异。”<sup>[9]2086</sup>作为一种文书种类,存查作为差票的副本,留存备查。

经初步筛查,《南部档案》中第一件存查出现的

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初三日<sup>⑬</sup>,最后一件是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九日<sup>⑭</sup>。在这期间,差票发生了一些形制上的变化,从原来笼统的差票文书,转变为更具体的差唤票、查勘票、传召票等。其格式更为规范(分计开人员、正文及附加章程三部分),类型更加明确(直接在文书上写明差票的具体种类“××票”)。在当时印制的附卷存查中,就明确印有“传人用传召票,缉贼用缉捕票,查勘用勘验票,追款用饬追票,谕饬用饬遵票,关传用关协票。”<sup>⑮</sup>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至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间,《南部档案》中所见存查共565件,与光绪三十四年以前形制相同的差票虽有出现,但数量很少,仅30件,且时间相对集中在宣统三年。由此可以看出,南部县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开始施行新的差票体制,并基本取代了此前的体制,成为之后常用的差票形制。作为文书种类的“附卷存查”也随着差票的这种变化而出现在《南部档案》之中。

在《南部档案》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以后,往往只能见到附卷存查,很少再看到差票。其实,差票与附卷存查原本联在一起,共有三联,第一联当为号簿(内号簿),第二联为“附卷存查”,第三

联为“××票”雕板印制,有固定的版式框(图4、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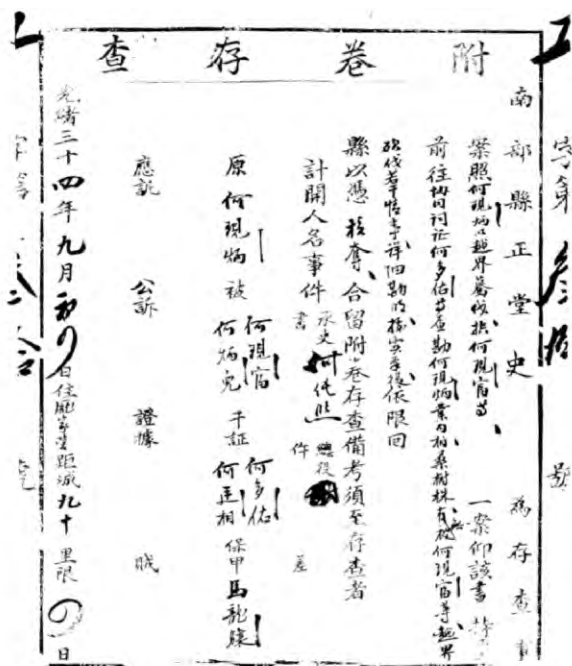


图4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南部县正堂史为何现炳具告何现富等越界募伐柏树逞刁行凶事存查(《南部档案》Q1-18-8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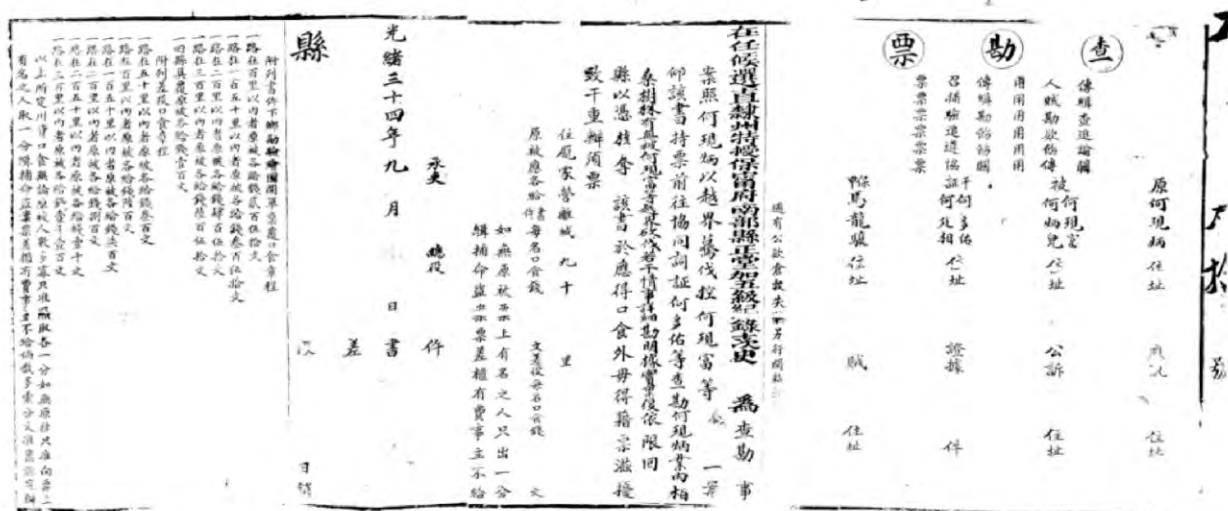


图5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南部县正堂史为查勘何现炳具告何现富等越界募伐柏树逞刁行凶事查勘票(《南部档案》Q1-18-807-5)

第一联 在现存《南部档案》中,未有发现。

第二联“附卷存查”的版式框之外,左右分别有“×字第×号”的编号,与第一联、第三联相联属。如“工字第叁拾号”,“工”指档案所属房别为“工房”,“第叁拾号”为该件的编号为第30号。在版式

框内部,上面横列有“附卷存查”4字,表明文书性质。从右开始,为存查正文,印制内容为“南部县正堂×为××事(光绪三十四年印制内容为“为存查事”)案照……,仰该×持票前往……,依限回县以凭××。合留附卷存查备考,须至存查者”。

其后列“计开人名事件”,依次印有衙门人员“承吏、书”、“总役、仵”、“差”,以及涉案人员“原”“被”“干证”“保甲”“应讯”“公诉”“证据”“贼”等,使用时依据实际情况填写。左边是时间、被唤人等住址及办差期限,“×年×月×日,住××,距城××里,限×日”。

第三联即差票。版面分为三个部分:最右为第一部分,顶部横列“××票”,表明文种,如“查勘票”“传召票”等,体现差票类型,主要内容即开列涉案人员姓名及其住址,如“原”“被”“干证”“保甲”“应讯”“公诉”“贼”“证据”等,使用时依据实际情况填写。较之以前的差票,此部分内容所处的位置由文末,改题于文首,更为直接清晰。第二部分为差票正文,主要内容与附卷存查相同,后面对书役的“藉票需索”作了明文规定,确切注明应给口食银数额。这事实上将以前的陋规规费变成正式的制度性费用,并将数量明确化。第三部分为具体的“口食章程”,罗列书、仵、差、役口食标准。

从上述档案可以看出,存查的主要内容如发文者、具体事由、目的、计开人员姓名、时间等都与差票相同。但差票和存查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书种类,除外观版式不作讨论外,也存在一些其他差异。首先是性质与作用不同:差票作为正式文书,是书役执行具体事务的凭证,使用完毕需回销,而存查直接留存作档案备查。其次,在行文内容上的差异:在署衔上,差票求“全”,完整标明发文者全衔,存查求“精”,简明扼要地表明发文者身份;在正文结尾的公式性语句上,差票对书役行为作规劝、限制,表明官府的态度和规定,存查则是对去向和作用作简要说明,“合留附卷,存查备考”。

各种差票文书如传召票、传唤票、差唤票等,都有着与其对应的附卷存查。大多数时候,档案中只能见到差票或存查中的一种,两者皆存的情况比较

少见,但仍可从存查或差票中窥见彼此的真实面貌。

### 三、结 语

档案文书种类繁多,其功能各异,体式有别,但也有些文种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差异不明显,容易混淆。一般的读者难于细究其中的差别,认清其内涵,即便是研究档案的学者,也有不少人对此头痛不已,甚至专门的档案整理者,在标注时也偶有混淆文种的情况。

州县官处理刑名、钱谷等公事,免不了要用传达和执行州县官意志的文书,差票、签、存查便是其中较为常见的文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比分析三种文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形式、内容和功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其文种,还能从它们的发展变化中解析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更有利于清代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也对办公规范化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综合来看,差票和签多被用于查勘案情、传唤人员、拘押人犯等,在文书形式、内容和功能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又明显有异,特别是被唤人员名单,前者多单独开列于正文之后,数量较多,而后者多夹叙于正文之中,人员数量较少。在署衔、事由以及办差地址和期限等方面,签较差票简略。虽然签在形式上没有差票规范严谨,但更为简捷,使用也更为方便。存查作为一种文书,出现时间较晚,是作为差票的副本留存备查的,与差票的进一步规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差票与签、存查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极其复杂,其间仍存在很多疑问待解。例如较之差票的严谨呆板而言,签更简捷方便,更易于操作,但却在防弊等方面有明显不足,又为何能够与差票一起沿用到最后?差票体制发生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作为制度使用的动词性的存查又如何转变为一种文种形式?如此等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杨和平]

#### 注释:

- ① 目前,未见学术界对签作专门研究。戴炎辉、滋贺秀三等人利用淡新档案对清代差票的运用程序及诉讼中差票类型等问题展开研究(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659—660页;[日]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载姚荣津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528—534页)。王铭通过清代青阳县的一则差票,考证了古代“票”的源流和画行制度,提出该票文的司法意义(王铭《清代青阳县档案中所见〈差票〉一则研究》,《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6期)。胡元德对票的流变进行过论述(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吴佩林利用《南部档案》中保存的差票,对其格式和内容作了诠释和解读(吴佩林、蔡东洲《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差票考释》,《文献》2008年第4期)。吴铮强则对差票制度进行了研究(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 ② 按,差票形制前后有所不同,为便于对比,此处重点对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前清代差票加以考察。此后的差票,下文比较差票与存查时有所涉及。

- ③ 《南部档案》Q1-7-874-5, 光绪五年十月初八日。
- ④ 《南部档案》Q1-7-873-1, 光绪五年十月初八日。
- ⑤ 《南部档案》Q1-5-189-4,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七日。
- ⑥ 《南部档案》Q1-17-577-2,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 ⑦ 《南部档案》Q1-8-496-9,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 ⑧ 《南部档案》Q1-18-405-4,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
- ⑨ 《南部档案》Q1-18-404-1,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 ⑩ 《南部档案》Q1-7-122-2, 光绪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 ⑪ 《南部档案》Q1-13-488-4,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 ⑫ 《南部档案》Q1-13-79-2,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 ⑬ 《南部档案》Q1-8-873-7,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 ⑭ 《南部档案》Q1-8-861-7, 光绪九年二月初七日。
- ⑮ 按 本文所论“存查”, 仅为在案件纠纷中作为差票副本而留存的“附卷存查”, 其他票据的副本不在讨论之列。
- ⑯ 《南部档案》Q1-18-1011-7,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
- ⑰ 《南部档案》Q1-22-368-6, 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
- ⑱ 《南部档案》Q1-18-1094-5,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

#### 参考文献:

- [1] 王 铭. 清代青阳县档案中所见〈差票〉一则研究[J]. 档案学通讯, 2002(6): 72-74.
- [2] 吴铮强. 信牌、差票制度研究[J]. 文史, 2014(2): 195-217.
- [3] 谷衍奎. 汉字源流字典[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8. 1617.
- [4] 滋贺秀三. 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C]//刘俊文, 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八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528-534.
- [5] 吴佩林.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差票考释[J]. 文献, 2008(4): 160-167.
- [6]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 [7] 黄六鸿. 福惠全书[Z]//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 官箴书集成: 第3册. 合肥: 黄山书社, 1997.
- [8] 李伟民. 法学辞源[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9] 李鸿章, 等. 奉敕修. 清会典事例: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mmons ,Signing Bills and Files for Reference

——A Case Study of Archives of Nanbu County Govern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JIN Sheng-yang ,YUAN Hui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The summons and the signing bill are common documen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be issued to the lower le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to deal with government affairs. They are quite similar in the form of documents and functions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em. The most intuitive distinction is the list of people to be summoned. The former has a large number and is separately listed in the back of the text while the latter has a smaller number and is interspersed in the text. The signing bill is simpl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the summon in terms of title ,main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such as service address and deadline. The file for reference is a kind of document that is used as a duplicate retained for future reference. Its appearance is late and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summons.

**Key words:** summons ; signing bill; file for reference